



李 发 林 著

齐故城瓦当

文 物 出 版 社

齐故城瓦当

李发林 著

文物出版社

封面题字：夏 鼐

封面设计：仇德虎

齐 故 城 瓦 当

李发林 著

*

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五四大街29号

顺义兴华印刷厂印刷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1990年2月第一版 1990年2月第一次印刷

850×1168 1/32 印张：6.25

ISBN7-5010-0315-7/K·123 定价：7.00元

前 言

瓦当，这种古代宫殿屋檐上的建筑构件，是保护檐椽不受风雨侵袭的屏障。瓦当上的花纹、文字，随着时代的迁移而有不同的变化。当我们想确定某一个古代城址的年代时，从这个城址中采集或发掘得到的瓦当就成了可靠的指示物之一。再结合对城址中出土的其他遗物的研究，就能比较准确地断定某座古城的年代。若从美术的角度看，优美的瓦当花纹，又是研究古代图案艺术的极好资料。古朴浑厚的瓦当文字，则是研究古代文字变迁发展的重要资料。因此，古代瓦当在考古学、古建筑学、古文字学、美术史等学科方面，都无可置疑地占有一定的地位。

临淄齐国故城瓦当，从晚清被金石学家注意以来，已经约有百年了。但一直到解放前，只有一些采集的传世品。其拓片散见于各家著录之中，实物则大都已不知去向。那时没有正式的考古发掘资料，地层关系不明确，很难进行系统比较和研究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有关部门和大学曾先后于1958年、1965年和1976年在临淄进行规模不等的考古发掘，初步具备了系统研究临淄齐故城瓦当的条件。我有幸参加1976年临淄小城内桓公台附近的考古发掘，对其中所出瓦当很感兴趣。现在，不揣学识浅陋，冒昧写成这本小书，意思是把它作为引玉之砖，希望能由此引起对临淄瓦当的重视和深入研究。

山东大学历史系 李发林

1986年7月29日

目 录

- 一 繁荣的古代临淄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 1976年临淄小城内的考古发掘…… (8)
- 三 古代瓦当著录小史…………… (13)
- 四 齐故城瓦当的种类…………… (20)
- 五 齐故城花纹瓦当的题材内容…………… (168)
- 六 齐故城瓦当的演变和年代…………… (172)
- 七 齐故城瓦当的特色…………… (178)
- 八 齐故城瓦当纹样的渊源…………… (186)
- 九 齐故城瓦当的制作方法…………… (188)

一 繁荣的古代临淄

临淄，现属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。由于区人民政府前些年搬迁到胶济铁路线上的辛店，现在临淄仅是镇政府机关驻地了。如果你有机会去访问一下古代的临淄城遗址，将会发现，二千多年前的临淄十里古城，大都已成为绿色的田野；树木葱茏的村庄，错落其间；一条沥青公路在古城中部贯通南北。公路西边的桓公台和其东北的传说中的“晏婴塚”，仍旧巍然屹立。临淄小城的城墙，于绿色的庄稼中隐约可见。离公路不远，有一座两层楼的文物陈列室，陈列着解放后出土的各种文物。漫步在桓公台附近的田间小道时，可以看到古代建筑遗留下来的残砖碎瓦，散布各处。当然，你不必为古代临淄的毁灭而感到忧伤。因为它的衰落，从南北朝算起，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。新的、美丽的、超过古临淄规模的城市，已经在别的地方建立，古临淄已经让出了自己的重要历史地位。

为了研究古代临淄城所出的瓦当，我们先追溯一番临淄城的兴衰史。

据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说，在公元前859年时，“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，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，是为献公。献公元年，尽逐胡公子，因徙薄姑都，治临淄。”修建临淄城，大约是在那之后进行的。有关文物考古部门曾在大城的中部，现今的陶家寨东南，发现过西周晚期地层。这说明，临淄城的肇建时代是相当早的。

春秋时期，姜氏齐国经历了齐庄公（姜购）、齐釐公、齐

襄公、齐桓公、齐孝公、齐昭公、齐懿公、齐惠公、齐顷公、齐灵公、齐庄公（姜光）、齐景公、齐悼公、齐简公、齐平公等15位国君。临淄这时已成为相当繁华的城市。

《国语·齐语》提到齐襄公非常浮华、奢侈，说他“筑台以为高位，田狩毕弋，……九妃六嫔，陈妾数百，食必粱肉，衣必文绣。”这种浮华的生活自然是建立在齐国和临淄繁荣的经济基础之上的。

春秋时的临淄城郊有茂林修竹、园囿池沼，风景优美如画。齐国君臣酒酣饭饱之后，常到此游乐。如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说：“懿公四年春，初，懿公为公子时，与丙戎之父猎，争获不胜。及即位，断丙戎父足，而使丙戎仆。庸职之妻好，公内之宫，使庸职骖乘。五月，懿公游于申池，二人浴，戏。职曰：‘断足子！’戎曰：‘夺妻者！’二人俱病此言，乃怨，谋与公游竹中，二人弑懿公车上，弃竹中而亡去。”申池是申门附近之池。杜预说：“齐南城西门为申门。齐城无池，唯此门左右有池。疑此是也。”临淄城周一片平原，无山区可遮北来之寒风，而当时竟长有竹林，观其竟能隐蔽懿公车马，可知当时竹林之繁茂。临淄城东墙外为淄河，城西墙外有泥河，加上南墙外的竹林、池沼，可以说当时的环境真是优美之极。

齐灵公时，晋伐齐，灵公走入临淄。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说，当此之时，“临淄城守不敢出，晋焚郭中而去。”

“郭”，是指外城，如《孟子·公孙丑》说：“三里之城，七里之郭”。由此看来，临淄的大小城之制早在春秋之时已经形成。内城的城墙可能更高大、坚固，城内可以坚守，晋国军队只能焚毁郭中而去。

齐景公时，临淄城里宫观楼台，巍峨壮丽。据《晏子春秋》说，景公好大喜功，“修为宫室，广为台榭”。在齐景公住处，“皆雕文刻镂之观”，“文绣被台榭”，“繁钟鼓之乐，极宫室之观”，“穷台榭之高，极汙池之深而不止，务于刻镂之功、文章之观而不厌。”有一次，齐景公命人民筑“路寝之台，三年未息”。这个台筑得很高，以至于齐景公“登路寝之台，不能终，而息呼陞”，他“忿然作色不悦曰：‘孰为高台？病人之甚也。’”齐景公常登此台观赏远景，有时就宿于其上。

此时的临淄已经非常繁荣，人口也增多。《晏子春秋》卷六形容说：“齐之临淄三百闾，张袂成荫，挥汗成雨，比肩继踵而在”，临淄人丁之兴旺，可以想见。临淄城里，车马往来，熙熙攘攘，乘车者并且以车毂相击为乐趣，禁之不止。驾六马是天子之制，而齐景公僭服驾六马之车，往来于大道上。齐桓公、管仲之时，齐君从车仅三百乘。至齐景公时，从车已达千乘之多。此外，还有许多“牛马老于栏牢，不胜服也；车蠹于巨户，不胜乘也。”（《晏子春秋》卷二）文物考古部门在临淄大城东北角的河崖头村附近，曾挖掘和探测到三个大的殉马坑，殉葬的马匹竟有500匹之多。可见，《晏子春秋》中说的“牛马老于栏牢，不胜服也”，并非夸张之辞。

齐景公曾接受晏婴的意见，“卑辞重币而诸侯附，轻罪省功而百姓亲，故小国入朝，燕鲁共贡。”（《晏子春秋》卷三）可知，齐景公时的齐国是非常兴旺强盛的。

齐景公后期，齐国政治上逐渐腐败，经济上对人民的剥削加重。据《晏子春秋》卷二说：当时“齐国丈夫耕，女子织，夜以接日，不足以奉上。”《晏子春秋》卷四说：“民叁其力

二人于公，而衣食其一。公积朽蠹而老少冻馁。国之都市，屣贱而踊贵。”大夫田氏，就极力利用这种情况收买民心。齐国旧公量有四种：豆、区、釜、钟，逢四而登。田氏家量，改为逢五而登，“钟乃大矣”。而田氏“以家量贷，以公量收之。”（《晏子春秋》卷四）这就使得民心向田氏而背离姜氏。遂出现田氏代姜氏统治齐国之势。

战国时期，临淄更加繁荣。起初齐国经历了姜齐宣公、姜齐康公时期。之后，田氏代姜齐，将齐康公迁于海上，姜齐亡。田齐开始，经历了田齐太公、田齐侯剡、田齐桓公、田齐威王、田齐宣王、田齐湣王、田齐襄王、田齐王建等八位国君。齐宣王之时，临淄城成为中国最大最繁荣的城市之一。《战国策·齐策一》记述苏秦对齐宣王说：“临淄之中七万户，臣窃度之，下户三男子，三七二十一万，不待发于远县，而临淄之卒，固以二十一万矣。临淄甚富而实，其民无不吹竽鼓瑟，击筑弹琴，斗鸡走犬，六博蹋鞠者。临淄之途，车毂击，人肩摩，连衽成帷，举袂成幕，挥汗成雨。家敦而富，志高而扬。”一派繁华、热闹的景象，跃然纸上。此时，一般无官职的地主，也有非常富裕的。如《战国策·齐策四》提到的齐国处士田骈，有“营（资）养千钟，徒百人”，就说明这一情况。

西汉时期，临淄是汉高祖的长子齐悼惠王刘肥（庶出）及其子孙的封地。刘肥死，子齐哀王刘襄立。刘襄死，子齐文王刘则继立。刘则死，无子，国除。文帝十六年，复封刘肥之子刘将闾为齐王（孝王）。刘将闾死，子刘寿（齐懿王）立。刘寿死，子刘次昌（齐厉王）继立。刘次昌自杀，国除，改为齐郡。

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说西汉时期齐王国非常富裕，有“膏壤千里，宜桑麻，人民多文綵布帛鱼盐。”西汉临淄比战国时更加繁荣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说：“临淄，海岱间一都会也，其中具五民云。”五民，据如淳说，是“游子乐其俗，不复归，故有五方之民也。”如此看来，临淄城当时还有不少外来人口。《汉书·高五王传》里，主父偃说：“齐临淄十万户，市租千金，人众殷富，钜于长安，非天子亲弟爱子，不得王此。”主父偃把临淄说得比京城长安还要繁华。看来他是有所根据才这样说的。

西汉朝廷在临淄设有铁官、服官。关于西汉冶铁遗址，在大城内曾做过实地勘探，有一处面积竟达40万平方米（群力：《临淄齐故城勘探纪要》，《文物》1972年第5期），是全国同类遗址中最大的一处。齐三服官在西汉颇为有名。《汉书·贡禹传》说：“故齐时三服官，输物不过十笥，方今齐三服官，作工各数千人，一岁费数钜万。”可见此时临淄纺织业规模之大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说，临淄的纺织工人“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，号为冠带衣履天下。”西汉大约是临淄最繁荣的时期。单从户口看，即已比战国时期猛增三万户。

距离齐故城西南23公里的窝托村南，发现一处西汉初年的齐王墓，据推断可能是齐哀王刘襄的。主墓未发掘，仅其五个随葬坑，即发现12,000余件文物。堪称国宝的即有长达115.1厘米的矩形铜镜、鎏金薰炉、鎏金饰龙凤花纹径达37厘米的三件银盘等。众多精美的随葬品反映出西汉齐国强大的经济实力。作为齐国首府的临淄，其经济的繁荣、昌盛，也就不言而喻了。这进一步证实主父偃所言非虚。（材料见《考古学报》1985年第2期，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《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》

一文)

东汉时期，刘秀于建武十五年追封已死的长兄刘縯为齐武王。其子刘章为齐襄王。其后，刘章子刘石为齐炀王。刘石子刘晃为齐王，立十七年降爵为侯。之后，刘晃子刘无忌立为齐惠王。再后，刘无忌之子刘喜立为齐顷王。又后，刘喜子刘承继立。建安十一年，国除。临淄是东汉齐国的首府，仍然设有服官，生产供皇室及王公贵族们使用的高级纺织品。如《后汉书·章帝纪》里，诏齐相省的“冰纨、方空縠、吹纶絮”，就属于这类高级纺织品。《急就篇》末，东汉人增附二章，第一章首二句即说：“齐国给献素缣帛，飞龙凤凰相追逐。”表明临淄纺织品花纹精美、生动。王充在《论衡·程材篇》里说：“齐郡世刺绣，恒女无不能。”以上情况说明东汉临淄仍是相当繁荣的。

当然，古代临淄城也曾多次遇到战乱的破坏。小的骚乱如田氏与国氏、高氏的相互攻击就不必说，大的战祸就有好几次：

其一，公元前284年的五国侵齐，即燕国联合秦、赵、魏、韩共同攻打齐国。《战国策·燕策一》说：“（燕昭王）二十八年，燕国殷富，士卒乐佚轻战，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，与秦、楚、三晋合谋以伐齐。齐兵败，闵（湣）王出走于外，燕兵独追北，入至临淄，尽取齐宝，烧其宫室宗庙。”宫室、宗庙被焚，我们的研究对象瓦当也必被大批毁坏。

其二，齐王建时，齐灭于秦，秦卒入临淄，自然可能有一番战祸，但史载不详。

其三，楚汉相争之际，田儋、田假、田市、田都、田荣相继立为齐王。后来项羽攻“伐齐垒，王田荣兵败走平原，平原

人杀荣。项王遂烧夷齐城郭，所过者尽屠之。”（《史记·田儋列传》）其后，田广又自立为齐王，复被韩信袭破。战国宫室至此遂荡然无存。

其四，是在东西汉之交时，张步据临淄，被耿弇攻破。这一战乱，又将西汉齐王宫室毁坏殆尽。

其五，是五胡十六国时的战祸，使临淄又遭到破坏，东汉齐王宫室沦为废墟。《齐乘》中的“临淄县”条说：“后汉、魏、晋为齐国，青州理此，元魏为齐郡，高齐废入益都县……”北齐之废弃临淄，使之入益都县，决非偶然，而是临淄古城遭到彻底破坏的结果。1976年对临淄进行考古发掘时，桓公台北方的工地上，发现唐代墓葬两座。这说明唐代这里已经沦为墓葬区了。

古临淄城宫室就这样屡建屡毁，而房檐上的瓦当自然是破坏一批又一批。在北齐之后，古临淄之大小城已不复用。在小城的东面、大城的南面，筑起了一座新城，这便是延续到近代的临淄城。其西城墙建于古代小城的东墙基上，北墙压进大城里100米左右。新城规模很小，有人说它“新建”于元代（群力：《临淄齐故城勘探纪要》，《文物》1972年第5期）。此城在元代于钦的《齐乘》中已经提到，其肇建年代也许还可上溯，但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。因此城和我们所研究的战国两汉时期的临淄古代瓦当已经没有牵连，在此就不多说了。

二 1976年临淄小城内的考古发掘

本书所采用的瓦当相当一部分是1976年临淄古代小城内桓公台北的工地挖掘出来的。故此，对这次发掘不能不作一个简单的说明。

桓公台之名，不知起源于何时。清康熙年间编的《临淄县志》已有桓公台之名。但元代于钦的《齐乘》却没有提到，是知元代尚无桓公台之名，否则，《齐乘》不至于漏载。按今之桓公台恐即《齐乘》所说的“营丘”，位“临淄西二里塔寺后。”“塔寺后”之说很对，至今桓公台南犹有北朝大石佛像巍然屹立，元代为佛寺无可置疑。“西二里”之说亦非常正确，今佛像到西关之距离正是此数。《齐乘》还提到“晏婴塚”，说在“临淄古城”中“三里”。照此推测，营丘与晏婴塚相距不远。从晏婴塚到西关之距离亦恰好三里。故知今之晏婴塚，为《齐乘》所言之晏婴塚；今之桓公台，即《齐乘》所说之“营丘”。群力在《临淄齐故城勘探纪要》一文中说，今之晏婴塚，并非墓葬，而可能是衣冠塚。另外一个问题，今之桓公台，是否如《齐乘》所说，即当年太公望所筑的营丘，则很难说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“齐郡”下“注”引应劭曰：“齐献公自营丘迁此。”照此说则营丘不在临淄。又引臣瓚曰：“临淄即营丘也。故晏子曰：‘始爽鸠氏居之，逢伯陵居之，太公居之。’又曰：‘先君太公筑营之丘，今齐之城中有丘，即营丘也。’”师古曰：“瓚说是也，筑营之丘，言于营丘之地筑城邑。”照此说则营丘是临淄齐故城中的大土台。二

说何者为正确，只有待将来进一步考古发掘方能知道。

1975年冬，临淄城关公社社员在桓公台北300米至400米处平整土地，暴露了古代建筑遗址，发现柱础和铺地砖。报告给有关部门之后，领导上即组织了一支有山东省博物馆、北京大学、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参加的发掘队伍。从1976年3月15日到6月中旬在此进行了考古发掘，挖掘和清理面积近4,000平方米，证明所暴露的古代建筑基址属于西汉时期。

建筑基址遗迹包括有夯土墙、鹅卵石散水、铺砖回廊、铺砖的天井庭院、部分房间、石柱础等。

散水由众多的鹅卵石整齐排列而成，两边缘用竖立的素面方砖夹持。散水一边是回廊，另一边是庭院，向庭院略为倾斜。洁白的鹅卵石排列得非常整齐。

散水共发现五处。工地北部有两处，均不完整。偏西一处有四堆卵石，应是天井四角屋檐雨水集中下泻的地方。此天井很小，四面有素面砖铺路，天井内铺地的几何纹砖只剩下少许。偏东一处散水更残缺不全。工地中部偏北，是一处平面呈凸字形散水，东西长21.2、南北长8.9米。其南缘距上述两组散水仅约五、六米。其南北两侧有素面砖路，已残。散水环绕的庭院地面上铺满了几何纹花砖。庭院西北角有卵石砌成的泄水簸箕。庭院正中，有长、宽各约两米的外方内圆的散水，中间可能原有亭子建筑。庭院之西南，有平面呈刀把形的散水设施，南北长31、东西宽7.7米。散水的宽度仅0.7米。其东北角有泄水簸箕，正西有进水簸箕。散水外周的素面砖路，即回廊，环绕散水一圈，路面保存相当完好。庭院地面也铺有大量几何纹花砖，惟部分已被晚期红烧土坑和墓葬破坏。此处散水东南呈区形，南北长35.8、东西长30米。散水本身宽0.85米。

东部被麦田压着，试掘证明已无散水遗迹。

夯土墙发现数条，宽度0.6—1.2米不等。夯土墙用一种直径约6—7厘米的小圆平头夯夯筑。每层夯土厚度约10厘米。夯土墙边缘糊有黄泥，黄泥外表又抹石灰。从倒塌的堆积物中发现有红、紫、黄、蓝、绿等颜色，估计这部分墙壁上原来绘有彩色壁画。

在T71和T72里，发现有东西走向、南北平行的两条较长的夯土墙。它们之间，又有南北走向、东西平行的短夯土墙六条，从而组成五个房间。房间宽度4—5米不等。

工地南部发现数十块石础。石础直径最大有达1.2米的，厚度有的达0.6—0.7米。这儿可能是一个多柱的高大厅堂。由于石础在清理前曾被移动过，故厅堂平面布局已难以复原。在刀把形和匚形散水边上，均有一排较小的石础，直径约0.4—0.8米不等。这些石础间隔约4.5米，承托的是不太沉重的廊檐。以上所有石柱础，都未经过仔细打磨雕琢，没有修整出一个固定的外形，大多保留原石面，只是承柱的一面较平而已。这层石柱础之下，还有一层石柱础露头。我们判断，上层石柱础的时代应属于西汉，下层石柱础的年代则应属于战国。

工地北部有两个探方挖到了生土层。以T17丙为例，地层可以分为五层：第一层是耕土层，黄灰色，厚20多厘米。第二层是扰乱层，浅黄褐色，厚13—33厘米。出土少量青花瓷片、白瓷片和灰陶片、瓦片。时代约从北朝到明清。第三层是灰褐色土层，土质较松软，含有较多的汉代瓦片、砖块、铁块、炼渣、红烧土块，出有东汉五铢钱，底部常有大瓦片。此层厚度约24—70厘米，时代是东汉或延及西晋。第四层是黄褐色土层，质较硬，含红烧土块、瓦当、筒瓦、板瓦、铺地

砖、脊瓦、铁器和陶片。这层厚度为10—71厘米。其时代为西汉。第五层是深黄褐色土，质硬而粘，夹杂有红烧土块，还有瓦当、残豆盘、豆把和其他陶片。豆把空心较大，豆盘里外折角不如上一层明显。还出土残齐刀。此层厚度为10—73厘米，其时代为战国。第五层之下为生土。

发掘的4,000平方米，只见到五个庭院和回廊路面，以及少许的房间、多柱的厅堂。可见有待发掘部分尚有大量建筑群。

当时，这样大规模的宫殿归谁所有呢？

西汉时期，齐悼惠王刘肥是始封王。他死于公元前189年，即孝惠六年。刘肥子刘襄继立，是为齐哀王。吕后时，曾一度将齐国的济南郡割给吕王吕台，割齐之琅玕郡给营陵侯刘泽为琅玕王，割齐之城阳郡给刘章。诛诸吕之后，文帝即位，三郡复为齐国。文帝二年，分出城阳郡。文帝十五年（前165年），刘襄子刘则（齐文王）死，无子，国暂绝。文帝十六年，将齐国分为六，尽封刘肥的六个儿子，刘将闾为齐王，刘贤为菑川王，刘雄渠为胶东王，刘卬为胶西王，刘志为济北王，刘辟光为济南王。从临淄宫殿的宏大规模看，不是离析后的齐国能建立的，很可能是刘肥时的齐国所建立，只有大齐国才能调集那么多的人力、物力来建筑这样大规模的宫殿群。从发掘情况可知，此处宫殿建筑是非常豪华的。由巨大的石柱础，可以推断当时上部木构建筑必定非常宏伟壮观，柱子当又高又粗。建筑高大，通风就良好。在屋顶的上部，应盖着巨大的板瓦、筒瓦（板瓦仰置，筒瓦俯置），屋檐椽头上罩着各种花纹的瓦当。白色的墙壁上绘着色彩艳丽的壁画。庭院既多又宽广，各组回廊相互衔接，使居住者在风雨交加、雪花纷飞或

烈日当空的情况下，也能潇洒自如地往来于各组宫室之间。这一切，显示了我国西汉时期的建筑学家和建筑工人的智慧和创造才华。